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十六輯 第八冊

晚唐皮陸詩派研究

王永波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六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8 冊

晚唐皮陸詩派研究

王永波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晚唐皮陸詩派研究／王永波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276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六輯；第 8 冊)

ISBN 978-986-322-826-4 (精裝)

1. (唐) 皮日休 2. (唐) 陸龜蒙 3. 唐詩 4. 詩評

820.91

103013517

ISBN-978-986-322-826-4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六輯 第八冊

ISBN：978-986-322-826-4

晚唐皮陸詩派研究

作 者 王永波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9 月

定 價 第十六輯 21 冊 (精裝) 新台幣 3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晚唐皮陸詩派研究

王永波 著

作者簡介

王永波（1972～），男，湖北天門人。四川大學文學博士、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唐詩學、目錄版本學。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唐代郎官與文學研究》（13BZW061），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篇，著有《陳子昂集校注》、《梨雲樓目錄版本論集》等。

提 要

皮陸詩派是晚唐詩壇上一個重要的創作群體，與以李商隱、杜牧、溫庭筠爲主的綺艷詩派相比，他們在詩歌題材、體裁、風格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代表了晚唐詩歌的另一種創作風貌。皮陸詩派的成員主要有皮日休、陸龜蒙、羅隱、杜荀鶴、聶夷中等人，雖然他們大多數人是唐代的進士，但幾乎都沒有踏入仕途，屬於寒士詩人群體。長期在外漂泊與干謁，接觸到廣泛的唐代社會階層，對晚唐時期的政治、社會、市民生活有了較爲充足的瞭解，使得他們的創作敢於面對社會現實，接近下層民眾。詩歌內容充實，藝術風格多樣，繼承了漢魏六朝詩歌的優良傳統，本書即以皮陸詩派作爲研究對象，借鑒學界已有成果，對他們的文學創作進行了全方位的觀照。本書分爲六章，對皮陸詩派的生平、文學思想、詩歌創作、散文創作、後世接受與影響等予以了審視，尤其重視作品研究。通過全面考察皮陸詩派的全部作品，指出這個詩派的成員雖在政治上不得志，然而他們在文學創作方面，進行了積極地探索。在題材、體裁、藝術技巧等方面都有創獲，在晚唐詩壇具有重要影響。皮陸詩派的創作，既是晚唐詩歌的餘音，也爲宋詩高潮的到來做了準備，具有承上啓下的作用，這是他們對詩歌史的重要貢獻。



目

次

第一章 皮陸詩派與晚唐詩壇	1
第一節 唐前詩人群體發展概略	5
第二節 詩人群體與唐詩史進程	19
第三節 皮陸詩派的形成與界定	26
第四節 晚唐詩歌格局中的皮陸詩派	39
第二章 皮陸詩派的詩歌創作	53
第一節 皮陸詩派的詩歌理論	53
第二節 詩歌創作的主題取向	90
第三節 詩歌創作的藝術特色	123
第三章 皮陸詩派的散文創作	145
第一節 皮陸詩派散文創作的主旨	146
第二節 皮陸詩派散文創作的特色	160
第四章 皮陸詩派創作異同論	169
第一節 皮陸詩派與中晚唐其他詩人群的異同	169
第二節 皮陸詩派成員之間創作的異同	179
第三節 皮陸詩派個人創作分期的異同	186
第五章 《松陵集》與皮陸唱和研究	195
第一節 蘇州文會與《松陵集》的編撰	195
第二節 隱逸情趣精神風貌的真實展現	206
第三節 《松陵集》的創作特徵	240
第六章 皮陸詩派的影響及其餘波	253
第一節 皮陸詩派在唐末五代的影響	253
第二節 皮陸詩派在宋代的影響	258
第三節 皮陸詩派在明代的影響	263
主要參考文獻	265
後 記	273

第一章 皮陸詩派與晚唐詩壇

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首個以詩派相標榜的文學流派一致公認為是宋代的江西詩派。呂本中在《江西宗派圖》中首先提出「江西詩派」這個名稱，尊黃庭堅為詩派之祖，並開列了陳師道等二十五人的詩派名單，以後這個名單又不斷地在擴大，成為宋代很有影響的文學流派。但是，在江西詩派之前，以相似詩風構成趣味相投的詩人群體，文學史上卻可以舉出很多。例如鍾嶸《詩品》把古今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在具體的詩人品列中，他特別重視相同風格的詩人群體品評。卷中並列郭泰機、顧愷之、謝世基、顧邁、戴凱，並云：「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註1〕。卷下列王濟、杜預、孫綽、許詢，評曰：「世稱孫許，彌善美恬淡之詞」，〔註2〕鍾嶸明顯地抓住了這些詩人相似的群體風貌及其共同的審美特徵，雖然只是片言隻語的點評，然也彌足珍貴。這種詩人群體是一種文學史上獨特的現象，它的產生有著多方面的因素，它的形成與演變也是有多種形態的。可以這麼說，詩人群體的出現始終伴隨著詩歌史的發展，對研究詩歌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詩人群體的產生可以上溯到漢代，但是唐代的詩人群體卻尤為突

〔註1〕 曹旭《詩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5頁。

〔註2〕 曹旭《詩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85頁。

出。宋人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列述歷代詩體，「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南北朝體、唐初體、盛唐體、大曆體、元和體、晚唐體、本朝體、元祐體、江西宗派體」〔註3〕，唐代佔有五體。「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曹劉體、陶體、謝體、徐庾體、沈宋體、陳拾遺體、王楊盧駱體、張曲江體、少陵體、太白體、高適夫體、孟浩然體、岑嘉州體、王右丞體、韋蘇州體、韓昌黎體、柳子厚體、韋柳體、李長吉體、李商隱體、盧仝體、白樂天體、元白體、杜牧之體、張籍王建體、賈浪仙體、孟東野體、杜荀鶴體、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王荊公體、邵康節體、陳簡齋體、楊誠齋體。」〔註4〕共列三十六體，其中唐代多達二十四體，雖然這些體式多為單個詩人所創，但他們所創作的這種詩歌體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響到其他詩人的創作，從而形成或大或小的詩歌創作群體，帶動唐詩的向前發展，可見唐代詩歌的繁榮與詩人群體的密切關係。而且，嚴羽也很重視詩人群體的創作，例如他就特別標出蘇李體、曹劉體、徐庾體、沈宋體、王楊盧駱體、元白體等群體，這些體式多由兩個及多個的詩人組成，相對於個人的詩歌體式，影響要大些。前人往往喜歡津津樂道大詩人對於中、小詩人的影響，其實我看中、小詩人群對大詩人也是提供了很多藝術借鑒的，這一點卻往往被人忽視。

王兆鵬在《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一書的序中說：「文學史與詞史的實際都表明，一代文學風氣的轉變與形式，往往是由一代作家群共同完成的。缺乏群體的思考與整體的觀念，就無法理清文學史、詞史發展的脈絡。而中國文學發展到宋代，先後出現了許多自覺的文人集團和創作群體，不從群體的角度去研究，也很難深入瞭解宋代文學的新質與進展。」〔註5〕要想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學發展面貌和特徵，

〔註3〕 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53頁。

〔註4〕 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59頁。

〔註5〕 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頁。

最好的辦法就是進行群體研究，此外還有時段與地域研究，也是相當重要的。事實上，群體研究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專著就有數十部，如王巍《三曹父子與建安文學》（遼海出版社 2002）、王鵬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8）、姜劍雲《太康文學研究》（中華書局 2003）、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三聯書店 1996）、劉躍進《永明文學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2）、孫明君《三曹與中國詩史》（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9）、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呂肖奐《宋詩體派論》（巴蜀書社 2002）、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齊魯書社 1986）、伍曉蔓《江西宗派研究》（巴蜀書社 2005）、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中華書局 1995）、張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1）、馬東瑤《蘇門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楊勝寬《蘇軾與蘇門人士文學概觀》（巴蜀書社 2001）、蕭鵬《群體的選擇》（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2）、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2）、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齊魯書社 1993）、沙先一《清代吳中詞派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4）、曹虹《陽湖文派研究》（中華書局 1996）等。有關唐代詩人群體研究的著述也有不少，比如蔣寅《大曆詩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聶永華《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考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東方出版社 1993）、曾廣開《元和詩論》（遼海出版社 1997）、任海天《晚唐詩風》（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8）、趙榮蔚《晚唐士風與詩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中華書局 2002）、李浩《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張一平《趨向自我——中唐文學四大家心態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0）、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3）、蕭占鵬《韓孟詩派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9）、畢寶魁《韓孟詩派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 2000）、葛曉音《山

水田園詩派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9)、許總《唐詩體派論》(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4)、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鍾優民《新樂府詩派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9)等。此外,遼寧大學出版社和武漢大學出版社還各自出版了一套《中國古代文學流派研究叢書》,收入專著十多種。由此可見,群體研究在當下還是相當熱門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群體研究都是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重點,本文選擇《晚唐皮陸詩派研究》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也是置於此種學術背景之中。

在進行研究工作之前,有幾個概念我們想在此作些辨析,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淆。目前學界關於群體研究的定義比較混雜,有的稱為「集團」,如胡大雷的《中古文人集團》、賈晉華《論韓孟集團》;有的命名為「詩派」,如莫礪鋒的《江西詩派研究》、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蕭占鵬《韓孟詩派研究》等;也有的叫做「群體」,如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蕭鵬《群體的選擇》等;此外也有叫「宗派」、「文派」、「詞派」、「派」的,如伍曉蔓《江西宗派研究》、曹虹《陽湖文派研究》、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張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等等。稱謂有如許之多,似有辨析的必要。我們認為,文學流派是比較正式的說法,這裡的流派包括「詩派」、「詞派」、「文派」以及以其他方式命名的「派」。作為「詩派」,它有兩種存在形態,一種是自覺型的,另外一種是非自覺型的。所謂自覺型的詩派,意思是說這個詩派有自己的領袖人物,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影響著同時代的追隨者,並且有著相同的創作宗旨、文學口號和創作目的。詩派成員之間同氣相求,相互往來,唱和切磋,創作風格、傾向相似,產生了一批格調相近的文學作品,對當時的文壇有著廣泛的影響,比如韓孟詩派、江西詩派。所謂非自覺型的詩派,意思是說這個流派在形成的過程當中並不存在自覺結合的創作集體,也沒有人去號召去鼓動去吸引追隨者,只是由於歷史的時代的原因,有一批詩人在題材在體裁在風格等方面有著相似的風貌,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詩派,比如我們所熟

知的「山水田園詩派」、「邊塞詩派」、「苦吟詩派」等等。那麼作為一個「文學集團」，它的形態只有第一種，也就是自覺型的。文學集團相對於詩派來說，它的含意更為廣泛，集團成員之間往往聯絡緊密，一般來說它的領袖是政治人物，有著尊崇的地位，可以左右當時的文壇。成員的身份具有雙重性，即官僚和文士。文學集團的形式有多種，比如皇家文學集團，包括太子文學集團，諸王文學集團、世族文學集團、朝廷文學集團等等。文學集團的成員對於文學領袖具有依賴性和附屬性，這就決定它的文學創作在某種程度上有著天生的缺陷。關於文學群體的特徵，王兆鵬在《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第一章第四節《群體特徵》中概括為三點，即相對於正式的文學流派，文學群體具有鬆散性、流動性和開放型的特點。也就是說詩人群體它的成員往往是分散的，由於種種原因很難聚集到一起，但彼此之間有往來，有詩詞唱和，偶也聚會。同時，詩人群體成員不是一成不變的，往往具有開放性，也常常與群體之外的詩人廣泛的從遊唱和。這種特性使得整個群體始終保持著生機和活力，促進創作和發展，並擴大群體及其成員的社會聲譽和文學影響。基於這樣的界定，我們只能把皮陸詩人定位於詩派。

第一節 唐前詩人群體發展概略

中國古代文學的向前發展，固然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但是，文人群體所產生的作用卻是不可低估的。古代的文人群體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走到一起，形成集團或者流派，對於推動詩歌藝術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先秦時期我國就出現了士人群體，當時的所謂文人，是從「士」階層當中分化出來的一個獨立的群體。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就說：「士大體分為四類：一類是學士，如儒、墨、道、名、法、農等專門家，著書立說，反映當時社會各階級的思想，提出各種政治主張，在文化上有巨大貢獻。這一類人聲名大，待遇優……一類是策士，即所謂縱橫家。這一類人長於政論，富有才能，

憑口舌辯說，得大官取富貴……一類是方士或術士，這一類人可分為兩等，一等是天文、曆算、地理、醫藥、農業、技藝等學科的專門家，在文化上有巨大的貢獻；一等是陰陽、卜筮、占夢、神仙、房中術等騙取衣食的遊客。最下一類是食客，這一類人數量最大，流品最雜，其中包括雞鳴、狗盜、任俠、姦人、罪犯、賭徒、屠夫、刺客等無賴凶人，通過貴族將相來吸食勞動人民的血汗。」〔註6〕范文瀾將先秦時期的士階層按性質分為四類，那麼，先秦文人群體應該算是第一類了。其實，這些人的身份主要還是學士，他們的任務往往是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張和要求，如果要硬性規定的話，充其量也只能定為學人群體。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註7〕第一章裏將先秦時期的文人集團分類為三種，即學人集團、門客集團和國士集團。並且認為先秦時期文人集團的形成是由於士人獨立身份的取得和精神自由的獲得相結合的結果，先秦文人集團也具有自主性。我倒是覺得，先秦時期我國的文學尚未獨立尚未自覺，因此不會出現文學家群體或者是文學家集團。

真正具有文學意義的文學群體的出現應該是在漢代。漢代由政府出面曾組織過一些大型的文學活動，從而促成了一些文學群體的形成。漢代曾設置樂府機關采集歌謠，《漢書·禮樂志》載「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註8〕《漢書·藝文志》也說：「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註9〕《漢書·藝文志》還記載其篇目一百三十八首。漢代樂府機關裏的文人一方面采集歌謠，另一方面自己也從事創作，《漢書·禮樂志》記載文人為樂府機關作詩的情況說：「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註6〕《中國通史簡編》，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48到249頁。

〔註7〕《中古文學集團》，廣西師大出版社，1996年，第2頁。

〔註8〕《漢書》卷二十二，第四冊，中華書局，2002年，第1045頁。

〔註9〕《漢書》卷三十，第六冊，中華書局，2002年，第1756頁。

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註10〕《漢書·佞倖傳》也說：「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註11〕這說明，在漢代的時候確實有一批文人群體在爲樂府機關創作歌詩。皇帝們也常常在宮廷裏組織辭賦創作，班固《兩都賦序》云：「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藏，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註12〕《漢書·藝文志》就記載了這些「言語侍從之臣」與「公卿大夫」的賦作。朝廷有時候也下詔讓文人們寫賦，如《漢書·枚皋傳》云：「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遊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註13〕再如《漢書·王褒傳》：「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註14〕上述二傳的記載可以得知，在漢武帝手下的確有一批專職的辭賦作家，隨時聽候皇帝的差遣，以辭賦創作爲職事，從而形成了一批文人群體。需要說明的是，漢代的文人地位低下，視賦家爲倡優、俳優，故而也談不上什麼真正的文學獨立性。

在文學史上大放異彩的文學群體的出現，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三國時期，曹操是著名的政治家，同時他也愛好文學，周圍就聚集了不少的文學家，形成了文學史上著名的文人群體「三曹七子」。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秋，曹操下《修學令》，「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

〔註10〕《漢書》卷二十二，第四冊，中華書局，2002年，第1045頁。

〔註11〕《漢書》卷九十三，第十一冊，中華書局，2002年，第3725頁。

〔註12〕《文選》卷一，中華書局，2005年，第21頁。

〔註13〕《漢書》卷五十一，第八冊，中華書局，2002年，第2367頁。

〔註14〕《漢書》卷六十四下，第九冊，中華書局，2002年，第2829頁。

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生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註15〕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佔鄴城，並在此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自稱魏王，定都鄴城。隨著曹操軍事上的勝利，在文化上他也採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吸收大量的文人到幕府中來。建安文人在戰亂中也有了一個可以喘息的機會和安身立命的場所。對於這點，曹植在著名的《與楊德祖書》中說：「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註16〕曹操霸業不斷擴張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文人陸續投身曹魏陣營的過程。孔融、阮瑀、陳琳、徐幹、王粲等都先後入曹魏。當然，文人們投奔曹營的主要原因還在於政治而非文學，視曹操「唯才是舉」的政策吸引著他們來圓建功立業之夢想的，但是在客觀上又的確促成了建安文學的發展。在曹操的引導下，曹植和曹丕也各自吸收了不少的文學家。《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註17〕這裡所說的「置官屬」實際上指的是延攬人才，當然也包括文學之士。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丕立爲太子時，他手下的文士已經是粲然可觀了，有徐幹、應瑒、蘇林、劉廙、劉楨、王昶、鄭沖、荀緯等人。同樣，曹植手下也聚集了一批文士，包括邯鄲淳、司馬孚、任嘏、邢顒、鄭袤等人。當然，曹植、曹丕兄弟文學集團的成員也是在相互轉化的，比如徐幹、劉楨、應瑒等人先是在曹植陣營的，後來又轉移到曹丕陣營去的。

如此多的文人集中在一起，促進了詩歌的向前發展。這些文人經歷過戰亂，飽受兵燹之災害，對下層百姓的疾苦有著深刻的體驗和同

〔註15〕《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一冊，中華書局，1998年，第24頁。

〔註16〕《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53頁。

〔註17〕《三國志》卷一，第一冊，中華書局，1998年，第24頁。

情，其創作則以描寫戰亂、抒發憂患、渴望建功立業為主。如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以及曹操本人的《蒿里行》、《苦寒行》、《觀滄海》、《短歌行》等作品，都是產生於亂世中的不朽名作。這些詩歌繼承了漢樂府的優良傳統，揭露現實，同情民眾，抒發理想，在思想上具有高度的進步性。在詩歌藝術上，這些作品更見個性，充溢著慷慨悲涼之氣，建安風骨自此而形成。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註18〕「慷慨」「梗概」可以說是建安文學的特質，一直伴隨著建安文士的創作，在詩歌中時有表現，而且影響到唐詩，後世詩評家談及風骨，可以溯源至此。

可以說正是由於三曹父子的禮賢下士延攬人才，才致使「鄴下文人集團」正式形成，書寫了文學史上光輝的一頁。鍾嶸《詩品序》對此有過高度的評價，其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註19〕由於三曹父子的重視與扶持，此期文人的地位較前有了很大的改變。曹操信任文人，讓他們擔任一些重要的職務，比如讓徐幹任「司空軍師祭酒掾屬」，王粲、陳琳、阮瑀、路粹任「丞相軍事祭酒」，楊脩、繁欽任「丞相主簿」，應瑒、劉楨任「丞相掾屬」，陳琳任「門下督」等，同時又讓部分文人任曹丕、曹植等諸子官屬，如徐幹、應瑒任「五官中郎將文學」，劉楨任「平原侯庶子」，應瑒任「平原侯文學」等。隨著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生活的較為安定，文學的自覺性也逐步提上了日程，這是文學史上重要的一環。文士們有意識的創作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瑣細事務，舉凡動物、植物、珍飾、玩物、宴

〔註18〕《增補文心雕龍校注》卷九，上冊，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中華書局，2000年，第541頁。

〔註19〕曹旭《詩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頁。

飲等，都成為詩歌創作的對象，而且在技巧和辭采方面也有所貢獻。

「鄴下文人集團」的首領當然是三曹父子，這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特點就是群體性，君臣之間相互酬唱交流的機會非常的多。曹丕《瑯琊勒賦》序以及《寡婦賦》序中有「命陳琳、王粲作」、「命王粲並作之」等語。今查《全漢賦》〔註20〕目錄，王粲、陳琳均有《瑯琊賦》和《寡婦賦》存世。又如，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註21〕目錄可知，曹植、應瑒、劉楨三人均有《鬥雞》詩，曹丕、曹植、應瑒、劉楨、阮瑀皆有《公宴》詩，曹植、王粲皆有《三良詩》。此外，諸文士之間尚有大量的贈答詩和書信，甚至於還有相同題目的文章。例如，據《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註22〕目錄可知，應瑒、阮瑀皆有《文質論》，王粲、阮瑀皆有《弔夷、齊文》，曹丕、曹植、丁儀皆有《周成漢昭論》。曹丕隨曹操出獵，作有《校獵賦》，並命大家同作畋獵題材的賦，摯虞《文章流別論》說：「建安中，魏文帝從武帝出獵賦，命陳琳、王粲、應瑒、劉楨並作。琳為《武獵》，粲為《羽獵》，瑒為《西獵》，楨為《大閱》。」（《古文苑》卷七章樵注引《四部叢刊》本）曹植《七啓》序云：「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並命王粲作焉。」〔註23〕查《全漢賦》，知王粲所作為《七釋》，徐幹所作為《七喻》，可以看作是一時遊戲之作。文人群體的特徵之一就是群體創作，這在鄴下文人集團中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樣的群體創作，活躍了文學氣氛，激發了文人表現才華的欲望，充滿了文學創作的積極性，有利於文學的發展。建安文人群體成員之間，相互尊重，氣氛和諧，群體之間往往互為贈答酬唱。

〔註20〕《全漢賦》，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註21〕《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遼欽立輯校，中華書局，1995年。

〔註22〕《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嚴可均輯校，中華書局，1958年。

〔註23〕《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6頁。

據《建安七子集》〔註24〕可知，王粲就有《贈蔡子篤詩》、《贈士孫文始詩》、《贈文叔良詩》、《贈楊德祖詩》，徐幹有《答劉楨詩》，應瑒有《報趙淑麗詩》，劉楨有《贈徐幹詩》、《又贈徐幹詩》、《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等。據《曹植集校注》〔註25〕可知，曹植有《贈徐幹》、《贈丁儀》、《贈王粲》、《贈丁儀王粲》等詩歌。這類贈答詩，或讚賞勉勵對方，或敘述友情，或抒發自己的遠大志向，都無不具有濃濃的抒情意蘊。這一時期的文壇相對比較活躍，加上三曹父子的提倡，無論是在詩歌數量還是質量方面都較前有了前進，不愧「彬彬之盛」之說。

隨著建安末年「七子」的相繼辭世，到了文帝黃初時期，鄴下文人集團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詩人群體被零散的個體所代替。此期詩壇總的說來是冷淡，直到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公元240到248），才出現了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為首的「正始名士」和以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名士」，稍微改寫了沉寂已久的文壇面貌。「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有著本質的不同，雖然這都是兩個文人群體，但是他們的組成人員、創作傾向、活動範圍都是不盡相同的。從成員上來說，「正始名士」主要由上層社會的士人組成，這些成員基本上都是朝廷權貴或者世家大族的子弟，故他們所談論的問題多為政治，活動的主要方式為廣泛的社交活動和玄學清談，關注政治參與政治的意識很明顯，相反文學的興致不濃厚。從「正始名士」流傳下來的著作看，基本上都是探討玄學命題的，如何晏的《道德二論》、《論語集解》；夏侯玄的《本玄論》、《道德論》；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指略》、《論語釋疑》。這些論著具有較高的理論思維水平，有著高度的思辨性。「正始名士」這個文人群體嚴格意義上說不是文學群體，後人所豔稱的「正始之音」、「正始詩風」應該是指的另外一個群體，也就是「竹林名士」，

〔註24〕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中華書局，2005年。

〔註25〕趙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